

2010亚太安全环境：战略博弈、领土争端及发展趋势¹

孙建中

内容提要：2010年的亚太安全形势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不平静的一年。中国和平崛起速度、国际战略重心东移进程和美国“重返”东亚步伐同步加快，东亚地区格局开始出现重组现象：一方面，中美军事关系紧张，中日结构性矛盾加剧，俄罗斯对东亚的兴趣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形势扑朔迷离，领土争端明显激化，东亚国家两面性上升，尤其是东盟成员国在经贸方面更加依赖中国的同时，在安全上却进一步靠近美国，中国在亚太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环境有所恶化。展望未来一年，中俄关系将继续深化，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中美、中日、中印关系将有所改善，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深度博弈将成为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色；我国周边多数国家经济上依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模式将进一步突出，并可能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将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关键词：战略博弈 领土争端 亚太安全环境 分析与展望

一、亚太安全环境的复杂化

2010年，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多数国家逐步向美国靠拢，一个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和制衡对象的地区安全结构正在显现：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因“天安”号、中日“钓鱼岛”撞船和朝韩炮击等事件而进

孙建中 解放军某部研究员。

¹ 亚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采用广义概念。关于亚太概念，请参阅Derek McDougall, *Asia Pacific in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7, pp.6-7。

一步巩固,美、日、韩之间的各种军演和情报交流增多,有可能形成实质上的三国同盟;美国与东盟的“10+1”对话机制因美国直接介入南海领土争端而得到深化,以“10+8”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为新平台的亚太安全博弈框架初步搭建起来,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活动空间受到明显挤压。

(一)中美军事对抗加剧,美国“重返”东亚步伐加快。在2009年全球共同对抗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尽管中美两国同舟共济、相互合作,中国为确保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美国感觉到了自身力量的某种“衰落”和应对国际事务的力不从心,看到了中国不断崛起的实力及其对自己全球和地区霸权地位构成的巨大潜在挑战,因而提出了“重返”东亚的口号,旨在遏制和围堵中国。2010年初,美国宣布对台(湾地区)军售后导致中美高层军事交往中断,成为美国大举“重返”东亚的序幕。一是借助日本售美汽车存在的缺陷打击日本经济,迫使日本鸠山由纪夫政府改变其在冲绳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的立场和亲华倾向,鸠山因此而辞职,亲美派或鹰派势力在新政府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美日同盟关系得到巩固。二是利用“天安”号事件渲染朝鲜威胁,离间中韩关系,迫使韩国推迟收回美军战时指挥权的期限,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趋向强硬,美韩同盟关系得到强化。三是改变原有立场,直接介入南海领土争端以讨好东盟,推动东盟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努力使其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工具。¹ 四是通过举行各种联合军演将上述国家连为一体,显示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努力形成对华全面战略遏制态势,借此加固自己在东亚的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五是借助本地区其他大国特别是印度来加固其所构建的东亚战略体系,借此将东亚与南亚甚至中亚等地区连为一体,巩固自己在亚太的霸主地位。

(二)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日本防范中国力度加大。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重心进一步向亚洲靠拢,希望通过建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来巩固其在东亚的大国地位,日美关系因而发生松动迹象。然而,

2010年,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环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多数国家逐步向美国靠拢,一个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和制衡对象的地区安全结构正在显现。

2010年初,美国宣布对台(湾地区)军售后导致中美高层军事交往中断,成为美国大举“重返”东亚的序幕。

1 根据与美国军事关系的紧密程度,东盟10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紧密合作层次,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文莱6国;二是逐步合作层次,主要指越南、老挝和柬埔寨3国;三是无合作层次,只有缅甸1国。参见彦铭:“重返远东——美国第7舰队巡弋金兰湾内幕”,载《军事世界》,2010年第9期,第19页。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11日,美国和越南在南海海域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海军联合演习。在为期一周的演习中,美国出动了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内的多艘大型战舰。越美军事关系明显升温。参见胡向春:“美越军事关系升温及其未来走向分析”,载《现代军事》,2010年第10期,第20页。

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遭到了美国的强力打压,最终不得不回到自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上去。中国GDP超越日本后,进一步刺痛了日本人的神经,导致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菅直人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加以应对,不少日本国民的政治态度更加右倾,实际上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激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其结果是,日本民主党政府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持不欢迎态度,防范力度进一步加大,并开始与美国一道奉行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力图通过迟滞或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其在东亚的大国地位。这一点在日本政府2010年12月17日通过的作为未来10年国防政策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作为未来5年国防力量建设指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2011—2015年)中表述得非常明确。

(三) 俄罗斯重西不忘东,伺机强化其亚太身份。2010年,俄罗斯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进一步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靠拢,旨在通过加强与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以便为其顺利崛起打下牢固的物质基

俄罗斯在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更没有放弃为其大国崛起进行投棋布子的准备工作。

础。但是,俄罗斯在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更没有放弃为其大国崛起进行投棋布子的准备工作。一是针对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提高其在亚太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二是对阿富汗事务兴趣渐浓,同意为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运输通道,意在扩大对阿富汗事务的影响力。三是借日本宣布将包括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在内的

周边海岛、海礁纳入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时机,加大“重返”南千岛群岛的力度,突出其在东北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四是针对越南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着手强化与越南的军事与政治关系,彰显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五是针对变幻莫测的朝鲜半岛局势,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六是针对东亚战略地位的快速提升,加大了与域外大国印度的战略合作,以便构建一个以南亚平衡东亚的均势机制。

(四) 印度倚美靠俄,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日趋扩大。长期以来,印度始终不渝地追求世界大国目标。2010年,印度加快了实现其大国目标的步伐。一是加大军事投入,通过独立研发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对外购买美俄先进的武器装备等方式,实现印度军队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以便早日成为军事大国。二是追求世界政治大国目标,在继续扩大核力量规模、提高核力量质量的同时,不断加强和美俄等大国的合作,努力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三是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力争在亚太确立大国地位。四是奉行倚美靠俄防中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通过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方式来顺应美日越等亚太重要国家的防华心理,借此争取这些国家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遏制中国在亚太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美俄等世界主要大国更加重视印度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总统、普京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先后访印,并

与印度达成了包括军火贸易在内的多项协议。其中,美国不仅解除了对印度的武器禁运措施,还与印度开始了全面的战略合作,¹这使得印度在当前的大国战略博弈中能够处于一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有利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与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使得印度应对中国的信心更加十足”。²

(五) 朝鲜接班人问题基本敲定,但半岛局势持续紧张。金正日身体亮起红灯后,接班人问题便成为影响朝鲜政局的最大政治因素。2010年9月28日,金正恩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亮相后,朝鲜接班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外界普遍认为,为了获取政治和军事支持,金正恩在处理“天安”号事件和韩国军演等问题上采取了强硬姿态。对此,美、日、韩同盟集团反弹强烈,尤其是在“11·23”炮击事件上,甚至摆出了不惜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架势,导致半岛局势一触即发。然而,进入2011年后的第一天,朝鲜就改变对韩强硬政策,呼吁朝韩两国对话,半岛局势峰回路转,紧张状态明显缓和。但也有人认为,“鉴于北朝鲜2010年的恶劣表现,未来一年,其行为将更加捉摸不定”。³

(六) 领土争端加剧,东亚地区力量格局正经历重组。领土争端激化是导致2010年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撞船事件使中日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权争端更为复杂激烈;二是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领土主权争端因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毅然“登岛”而加剧;三是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虽暂能维持稳定局面,但美国的介入导致双方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领土争端深化加上战略博弈因素作用,直接推动了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重组:一是美、日、韩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有合为一体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不排除与美、澳、新同盟合流的可能性;二是美国与东盟出于各自需求而拉近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三是日本与越南为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共同应对中国而相互靠近;四是日本与印度出于共同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需求而开始更加密切的战略合作;五是中國为维护朝鲜半岛稳定而进一步加强了与朝鲜的关系。其结果是,以美国为中心、以中朝为主要防范对象的东亚地区安全态势正在逐步酝酿之中,后冷战时代的“新冷战格局”似乎正在形成。

以美国为中心、以中朝为主要防范对象的东亚地区安全态势正在逐步酝酿之中,后冷战时代的“新冷战格局”似乎正在形成。

1 “2010年1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国准备扶持印度建立网络部队,一同对抗数量日益庞大的中国大陆网络部队。”参见吕炯昌:“美印组成网络联合部队对抗中国大陆网军”,载《尖端科技》,2010年第7期,第87页。

2 “Pushing Back”,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8, 2010, p.49.

3 Melinda Liu, “North Korea Holds China Hostage”, *Newsweek*, December 27, 2010/January 3, 2011, p.10.

二、东亚安全新态势分析

大国战略博弈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层次还是东亚次地区层次上都呈现出“中美对抗”这条主线，两国间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结构性矛盾从后台走向前台，亚太安全环境呈现更加复杂局面。

2010年，亚太安全环境出现的种种新变化表明，大国战略博弈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层次还是东亚次地区层次上都呈现出“中美对抗”这条主线，两国间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结构性矛盾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而使得本地区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特别是领土争端随之放大并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有关各方不得不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在重要问题上不得不重新审视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立场，亚太安全环境呈现更加复杂局面。

（一）中国和平崛起速度加快，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相对衰落，导致亚太地区力量发生变动，是推动亚太格局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安全关系中继续

维持主要大国地位将成为决定该地区21世纪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另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是中国随着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长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会成长为什么样的大国”。¹ 根据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将导致战略格局变动的现实主义理论，当前，亚太格局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实力相对拉近所导致的一种结果。

当前，亚太格局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实力相对拉近所导致的一种结果。

我们知道，“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一直谋求在亚太扮演霸主角色”。² 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尽管只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分之一，却把俄罗斯和印度远远抛在后面，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一直处于不断缩

小的过程之中。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保持下去，那么，GDP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终有一天会超越美国。这正是美国担心的事情。对此，奥巴马总统在不同场合向民众再三保证美国决不做世界老二，其在2010年5月27日发表的上台以来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将“全力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保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凭借绝对优势，谋求绝对安全”作为最主要的安全目标。³ 为了遏制中国实力过快增长，迟滞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美国加快了“重返”东亚步伐，同时开始对中国采取打压措施：经济上，利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问题向中方施加压力；军事上，利用对台（湾地区）军售问题损害中美两军关系，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建制衡中国的地区均势机制；外交上，联合尽可能多

1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

2 Derek McDougall, *Asia Pacific in World Politics*, p.49.

3 王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解读”，载《现代军事》，2010年第8期，第18页。

的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共同应对中国，企图将中国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然而，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做法，将推动亚太格局发生变化的真实原因说成是中国实力强大后逐步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基调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打压中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也是为了确保那些感受到中国威胁的亚太国家更加安全，企图以此证明美国不仅是一个亚太国家，而且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二）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三国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各有所图。首先，俄罗斯为未来崛起积蓄力量、布局造势。俄调整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发展自己的经济，以便为其重新崛起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但是，俄军事上的动作与外交战略的调整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现象，说明俄并没有停止或放弃追求世界大国目标的努力。例如，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影响下，俄不知不觉地与美国下起了对手棋，不声不响地为自己构建有利的战略态势。其次，日本企图通过借助美印等外力制衡中国，巩固自己在亚太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日本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亚洲主导权之争、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后，导致日本在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上越来越处于劣势，迫使其不得不借助美国、印度、越南等外力来抗衡中国，迟滞甚至阻止中国崛起。日本《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将中国的军力提升和有关军事活动视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威胁”，因而需要提高自身的“机动防御能力”，同时强调“应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并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等加强防务合作”。¹ 因此，有学者断言“未来中国大陆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摩擦只会更加严重”。² 最后，印度通过奉行“远交近攻”政策打造世界大国身份。印度的大国目标包含三重内容：一是全球大国身份，以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为标志；二是亚洲大国身份，以拥有亚洲优势为标志；三是南亚霸主身份，以将南亚打造成自己的后院为标志。因此，在每一层次上，印度都面临着一个重要对手：在全球层次上是美国；在亚洲层次上是中国；在南亚层次上则是巴基斯坦。对于印度而言，要同时应对这些对手不太现实，因而确立了在不同时期防范不同主要对手的策略。目前，印度已将主要对手从巴基斯坦转移到中国身上，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是其未来安全的主要威胁”，³ 必须加大介入东亚事务的力度。

（三）亚太国家对和平崛起心情复杂，为美国编织亚太地区网络提供了重要条件。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让美国等大国感到极不适应，而且还使亚太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感到很不适应（其实中国自己也感到不适应），心里充满矛盾心情，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扩大对外贸易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

1 参见 <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2010-12/18/3576534-0.shtml>。

2 吕炯昌：“日本的中共焦虑症”，载《尖端科技》，2010年第6期，第79页。

3 区肇威：“争当全球性军事强国——印度的国防现代化之路”，载《军事世界》，2010年第7期，第43页。

亚太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普遍感到不适应使其不自觉地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它们对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突然增大，为美国“重返”东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制衡中国提供了重要基础，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亚太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方面又深深地怀疑中国在强大后很可能会对外扩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威胁其国家安全利益。亚太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普遍感到不适应使其不自觉地提高了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它们对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需求突然增大，为美国“重返”东亚、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制衡中国提供了重要基础，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亚太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维持政权的稳定与连续性是朝鲜最大的国家利益，是理解当前半岛局势的核心因素。朝鲜半岛局势是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而朝鲜又是影响半岛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朝鲜而言，维持政权和确保第三代领导人顺利接班与稳定过渡是其核心关切所在。然而，朝鲜新领导人在正式接班之前通常都需要通过展示强硬政策来赢得军方支持，因为只有得到军方支持后，才能稳固新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这也是我们在2010年看到朝鲜在“天安”号事件、

六方会谈、“11·23”炮击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超强硬态度的主要原因。

（五）领土争端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有关各方宁愿诉诸武力加以捍卫也不愿意通过谈判做出让步。国际关系历史进程表明，在各类国家间争端中，领土争端最为敏感，最容易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2010年，亚太地区领土争端有所加剧，除了传统的主权因素外，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无形中增大了与中国存有领土争议国家的焦虑感，希望在中国未拥有绝对优势之前解决领土争议；二是借助中美两国交恶之机，利用美国人的力量达成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三是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议地区均是蕴藏着丰富油气资源的海域，且处于海上要道之上，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非常高；四是美国借助与中国对抗的机会，公开介入东海和南海事务，明确支持日本和南海有关国家与中国抗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使得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还导致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更加难以解决。

展望2011年，中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中美、中日、中印关系将有所发展或改善，但中国与三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朝鲜半岛局势因美国全面“重返”东亚而受到影响；俄日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升温而走向不定；深度博弈将成为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是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议地区均是蕴藏着丰富油气资源的海域，且处于海上要道之上，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非常高；四是美国借助与中国对抗的机会，公开介入东海和南海事务，明确支持日本和南海有关国家与中国抗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使得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还导致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更加难以解决。

三、亚太安全形势未来走势

亚太安全环境在过去一年里的进一步复杂化表明：中国和平崛起进程虽不可阻挡，但肯定会充满坎坷，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力度在增大，而美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内仍然是国际社会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其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战略资源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亚太安全形势仍将

维持“一超多强众弱”的基本格局。展望2011年,中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中美、中日、中印关系将有所发展或改善,但中国与三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朝鲜半岛局势因美国全面“重返”东亚而深受影响;俄日关系因北方四岛问题升温而走向不定;深度博弈将成为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歼—20战机的亮相和航母建造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可能会刺激美国 and 亚太其他主要国家的神经,激起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触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导致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相应增大。

(一) 国际战略力量继续向亚太地区汇集,东亚将成为国际政治重心东移的核心所在。中国和印度仍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日本仍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地位,亚太在全球政治中的战略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这将使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重要国际战略力量更加重视亚太的战略价值,并积极参与亚太事务,以便影响亚太的战略走向,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自身的利益。在国际战略力量向亚太汇集过程中,东亚地区处于核心地位,南亚地区也是一个受到大国重点关注的对象。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¹ 据此判断,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将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平台,其中,有关各方都将围绕着争取、影响和防范中国这个核心目标而展开活动。然而,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亚太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依据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来决定自己的重大立场。因此,东亚多数国家经济上依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模式将进一步突出,并可能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形成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基本格局。

东亚多数国家经济上依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模式将进一步突出,并可能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形成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基本格局。

(二) 中美战略利益与合作层面逐步加大,但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下去。不少人都承认,“中美合作对于维护诸多问题领域里的全球和地区秩序至关重要,但是要维持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稳定的合作比较困难”。² 2010年1月上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军高层交往的正常化。中旬,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原则上确立了未来10年乃至30年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这意味着为最大限度减少中美关系发展的摇摆性,推动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某种战略保障。然而,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戒心并没有因此而放松,继续对华奉行“两面下注”政策。例如,盖茨在2011年2月17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虽然乐观表示中美尖端战机实力差距仍然“悬殊”,中国想要量产并部署歼—20

1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姚云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 Rosemary Foo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Cold and Warm Peace”, *Survival*, December 2009/January 2010, p. 124.

隐形战机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美国的尖端战机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大大超过中国。¹但他的话实际上暗含着美国对中国战略武器快速发展的担忧，尤其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将使得美国在未来几年乃至十年之内都难以为其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²正因为如此，美国

为维持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美国将奉行亲日压中拉印排俄的亚太政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降低中国崛起成本与加大中国崛起成本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在军事上仍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各类军演将更加明确地指向中国，甚至针对朝鲜的美日、美韩军演也带有防范中国或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经济上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削弱中国在亚太的经济基础。总之，为维持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美国将奉行亲日压中拉印排俄的亚太政策，³即在亚太地区编织更多的区域网络，把中国内嵌在其中，通过均势机制来规范中国的行为，确保其发挥的作用符合美国的要求。可以预料，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降低中国崛起成本与加大中国崛起成本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加突出。

（三）中日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除，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比较敏感的磨合阶段。中日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领土争端和亚洲头把交椅的争夺等方面，而中国GDP超越日本后，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敏感，防范心理更加强烈，对抗意识更加浓厚。进入2011年后，日本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中日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中日两国关系更加敏感的事实，因为日本民主党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动机并不那么单纯，至少包含着以下四种意图：一是通过逐步扩大中日经贸关系，改善日本经济状况，提高民众对现政府的支持率，为其维持政权稳定和赢得下一次选举创造条件；二是北方四岛问题进一步突出，日俄关系趋于紧张，在客观上要求日本进一步密切日美同盟关系，同时改善日中关系，以便借中国之力牵制俄罗斯；三是通过改善对华关系进一步巩固日本“合法占有”钓鱼岛的既成事实，为下一步将领土争议问题的重心转向北方四岛创造便利条件；四是通过奉行“两面下注”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在亚太特别是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外交活动空

1 参见 <http://news.sina.com.cn/w/2011-02-19/042121979431.shtml>。

2 Aaron L. Friedberg,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 *Survival*, August/September 2010, p.48.

3 在中国和平崛起势头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下，美国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性地复制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在欧洲奉行的“双重遏制”政策。“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美国的西欧大战略。因此，美国‘让俄国人靠边站’（keeping the Russians out）的政策与‘让德国人抬不起头’（keeping the Germans down）的目标开始纠缠在一起。”参见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间,避免因树敌过多而成为孤家寡人。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政府的寿命可能不会太长,联美制华仍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所以,中日关系在相当时间内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善。

(四) 俄日领土争端进一步凸显,将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进入2011年之后,俄日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领土主权矛盾明显加剧。2月4日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登上国后岛和择捉岛视察,并在空中巡视了色丹岛。2月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北方领土日”纪念会上谴责2010年11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国后岛的视察行为,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粗暴行径”。2月1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指示国防部长,为南千岛群岛配发最新武器装备,以“保卫与日本有争议岛屿的安全”。¹2月10—12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问俄罗斯,寻求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途径并商讨菅直人首相访俄事宜,结果无功而返,两国在解决争议岛屿问题上陷入僵局。2月16日,俄罗斯两架“图—95”型战略轰炸机穿越争议岛屿上空,并在日本海和太平洋海域巡逻飞行,显示捍卫南千岛群岛主权的决心。此外,2月7日和15日还先后发生了日俄两国的少数人在对方驻本国大使馆附近侮辱和焚烧对方国旗的挑衅性行为。俄日在争议岛屿问题的对抗导致两国关系趋向僵化,因为俄罗斯出于扩大在东北亚的作用和提升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将不断加大对南千岛群岛的开发和防御力度,而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主权要求也不可能出现任何软化,这势必对亚太地区其他大国产生重要影响,为亚太安全环境增添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五) 中印结构性矛盾不断增大,两国关系进一步趋向复杂。印度在人才、语言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大国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为它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从而使得它能够越来越接近大国目标。在此过程中,印度由于深受“安全困境”和“远交近攻”等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历史积怨因素,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上升,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趋向明显,其中,边界领土争端很可能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诱因。与此同时,在达赖集团、中巴关系、海上战略通道甚至印度洋护航等问题上,印度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摩擦。因此,在印度和中国的大国身份确立之前,两国关系将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

(六) 中俄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加大,战略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加强。2010年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表明,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不等于忽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更不是放弃追求大国目标。随着亚太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俄罗斯参与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趣日趋浓厚,而通过吸引外资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特别是南千岛群岛的经济开发力度,将是其未来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和扩大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1 参见 <http://mil.qianlong.com/37076/2011/02/18/4662@6651726.html>。

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借助中国经济实力开发上述地区和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将成为一个主要选项。这将有力地推动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总的看，美国在亚太格局中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各种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将持续发生变化。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干预变量相应增多，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阿巴反恐、俄日岛屿之争、台湾（地区）、南海、东海等地区内部的热点问题进一步敏感化，领土争端因素更加凸显。

总的看，美国在亚太格局中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各种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将持续发生变化。特别是，东盟与印度将彼此接近，有可能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印度全面介入东亚事务提供便利条件；欧盟将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力度，努力构建中美欧三边体制，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干预变量相应增多，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阿巴反恐、俄日岛屿之争、台湾（地区）、南海、东海等地区内部的热点问题进一步敏感化，领土争端因素更加凸显，日本和俄罗斯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矛盾的加剧以及2011年2月初在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爆发的柏威夏寺武装冲突都是典型例证。在此背景下，中国“若单纯依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和坚持政治谈判的解决方式，不仅难以彻底解决南海海域主权争端，反而会导致海域继续被侵占。因此，中国应探讨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模式”。¹此外，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新一轮的“全球政治觉醒”²似乎开始变为现实：2011年初中东地区国家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不仅导致突尼斯和埃及总统下台，而且还有扩大蔓延之势，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约旦、伊朗等国深受冲击，利比亚甚至爆发了内战。这说明，伊斯兰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高强度的“政治地震”，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或转移美国对东亚的战略注意力，迫使其对亚太战略进行一定调整，继而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复杂影响。

1 邵建平、李晨阳：“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156页。

2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第1页。